

略論形成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化學動力源泉

李嘉曾*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思想體系的核心。三民主義的形成，是特定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和特定社會環境中厚積薄發的一種歷史必然。對於三民主義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可謂車載斗量。本文擬從文化學的視角切入，考察三民主義形成的動力機制。

概言之，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初期，在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大灣區，促使孫中山思想火花綻放，最終凝聚成三民主義的動力機制是：傳承、借鑒和創新。

一、傳承

作為孫中山廣義故鄉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中華民族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珠三角地區很早就劃歸中國的版圖，並在經濟、文化發展中嶄露頭角。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漢時廣州已為輻輳雲集的一大都會，至乾隆一口通商，國際貿易臻於極盛，‘十三行’名震天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不斷有大量的人口，從北方翻越五嶺進入廣東，最終到達珠江三角洲定居下來。中原的文化持續不斷地通過移民影響着珠三角……對中原文化的保存和堅守使得珠三角反而成為‘禮失尋諸野’的蔚然有古風之地。”¹ 有緣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出生並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孫中山自幼便接受了中華文化的薰陶，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

正是這樣的堅實基礎，才使得孫中山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以傳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己任。1921 年 12 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孫中山明確回答：“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² 孫中山曾經高度評價孔子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的卓著貢獻：“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甚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為甚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功夫。”³ 中國有個成語叫見賢思齊，三民主義思想的形成無疑是孫中山以先賢孔子為榜樣，傳承與弘揚中華文化的必然結果。

* 東南大學教授、澳門中西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會理事長

(一) 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熱愛是孫中山投身革命的內因

孫中山自青年時代開始便矢志革命而終生不渝，究其緣由，以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熱愛為核心的愛國主義是根本的內因。孫中山出生在鴉片戰爭之後二十餘年，生逢風雨飄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耳聞目睹列強入侵、皇權腐敗，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1894年孫中山創建了平生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在親自起草的該會宣言中開宗明義：“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進而“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⁴，愛國主義情懷溢於言表。

即便在深諳中國落後現狀的情況下，孫中山仍對我泱泱大國的悠久文化愛之深切。1905年7月，他曾在東京華僑和學生的歡迎會上致辭時深情表述：“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⁵

孫中山在其嘔心瀝血完成的代表著《建國方略》的“自序”中，有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為尤速尤易也”。⁶《建國方略》是孫中山1917年7月在廣州建立軍政府領導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後，認真總結以往革命經驗、構思建國綱領的成果，既是孫中山革命理念的提煉與概括，又充分體現了熱愛祖國和中華文明的愛國主義情懷。

(二) 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是創建三民主義的第一推動力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萌生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毋庸諱言，這一思想的產生明顯受到歐美的影響。孫中山較早推介三民主義的文字見諸1905年11月為《民報》撰寫的“發刊詞”，其中坦言“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⁷然而，即便是在宣傳歐美三民主義先進理念的同時，孫中山仍對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中華文化充滿信心。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孫中山堅信：“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己，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⁸字裏行間，洋溢着無比堅定的自信心，令人感佩。

孫中山由愛國主義導致的文化自信在對待中國文字的態度上得到充分體現。《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第三章“以作文為證”中，有一段關於中國文字的論述：“夫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眾，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族，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佈流用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⁹在將中國文字同世界諸國文字作出對比後，孫中山進一步肯定了中國文字的歷史功績：“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社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

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¹⁰ 正是這種強烈的文化自信，成為催生三民主義的強勁推動力。

1924年1月至8月間，孫中山以系列演講的形式系統總結了自己的三民主義思想。在闡釋三民主義產生原由、發展沿革與豐富內涵的同時，孫中山也充分展示了對於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在首先推出的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他就無比自豪地宣稱：“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¹¹ 為了奉獻於這樣優秀的民族，宣導三民主義而革命終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三) 中華文化的優秀內涵是三民主義的不竭來源

關於三民主義的本質，孫中山曾經作過簡要的概括：“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為他種族所壓制……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同為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¹² 仔細推敲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涵，特別是細讀孫中山的有關論述，不難發現三民主義的精髓都能從中華文化中找到出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涵是三民主義的不竭來源。孫中山系統闡釋三民主義思想時是按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樣的順序展開的，我們不妨也按照這個順序來進行考察。

1. 民族主義

孫中山認為，“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¹³，進而指出，中國人崇拜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忽視國族主義，從而導致民族主義的缺失。然而，孫中山也追憶了中國歷史上國族主義的萌芽：“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即變時雍。’他的治平功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得萬邦協和，黎民即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禦外的好榜樣嗎？”¹⁴ 孫中山強調，要想恢復民族主義、恢復民族地位，先要恢復民族精神和傳統道德。至於傳統道德，正是中華文化中所固有的：“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¹⁵ 由此不難想見，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來源。

2. 民權主義

孫中山在其《民權主義》的第一講中，便開宗明義地為民權作出界定：“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¹⁶ 他在回顧了希臘、羅馬時期民權主義的萌芽之後，接着追溯了中國民權思想的濫觴。他指出：“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用君權，實際上是在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崇拜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¹⁷ 所以孫中山得出如下的見解：“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¹⁸

為了落實民權主義的理念，孫中山主張“政權”(即“民權”)同“治權(即政府權)”分開，進而提出四大“政權”和五大“治權”的構想。四大政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五大治

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¹⁹ 就治權而言，前三種權力(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是外國已有的；而後兩種權力(考試權、監察權)則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²⁰ 上述資料表明，孫中山的民權思想無疑也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養料。

3. 民生主義

1924年8月，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系列演講進入民生主義階段，在第一講中，孫中山給“民生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故民生主義……即是大同主義。”²¹ 此前在其他場合，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還有類似的闡述。如“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使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²² 可見“大同思想”是民生主義的真諦。

大同思想是中國古代春秋末期到秦漢時期興起的社會理念，其源頭可以追溯到《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固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²³ 孫中山三民主義將“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作為最終目標，顯而易見是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啟迪並從中得到借鑒的。

孫中山認為，在中國，不僅有古人早已提出大同思想，而且有近人大膽實踐民生理念。他指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有制度，當時所謂工人為國家管理，貨物為國家所有，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²⁴ 可見無論是民生主義的理念還是實踐，都同中國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因此，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足以成為民生主義的重要源泉，傳承正是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機制。

二、借鑒

不可否認，孫中山在創建三民主義的過程中借鑒了外國的先進思想理念，這是同孫中山出生、成長以及生活、奮鬥了大半輩子的故土密不可分的。在偌大的中華帝國版圖中，珠江三角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所決定，具有獨特的作用。從對外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珠三角是中國近代思想和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裏是中國最先睜眼看世界的地方……同時，珠三角也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華僑之鄉，數以百萬計的華僑分別前往南洋、西洋和東洋謀生求學，對中國近現代的歷程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²⁵ 正是處於這樣的地理環境中和歷史條件下，孫中山得以借鑒世界各國各地的先進思想，為三民主義的形成汲取養料。

(一) 客觀承認西方革命與先進文化的社會功能

孫中山自幼便遊學海外，所到之處，尤其留心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因此很早就對一些西方國家的發展與進步有所感悟。1894年，他在年僅28歲時曾經上書當時的權臣李鴻章，表述了自己的心得：“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²⁶ 足見青年時期的孫中山已經對一些西方國家的進步與發達有了較深的體會。

1. 西方文化的進步首推科學發展

孫中山深諳西方文化的進步首推科學之發展。在其代表著《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中，他從“今日人類之文明，已進於電氣時代矣”講起，列數“無綫電通信”、“化學工業”、“有機化學”、“仿製瓷器”、“達爾文進化論”，乃至“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諸多領域之科技成果，推引出“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以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²⁷的結論。在此基礎上，他還以日本為例，印證了科學對東方世界的重要影響：“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步，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²⁸

2. 革命對社會進步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

在肯定科學極大地促進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從制度文化的層面考慮，孫中山進一步指出革命對於社會進步能夠發揮更大的推動作用。他曾數次列舉歐美國家發生革命後的顯著效果：“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之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制度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²⁹

正因為認識到社會革命的積極意義，孫中山在投身革命的過程中逐漸對革命的目的作出概括與總結：“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中國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達到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³⁰，而在孫中山的心目中，這個“至完美的國家”便是“一個真中華民國”。³¹ 至於怎樣才算是“真中華民國”，孫中山顯然是從美國的經驗中得到借鑒的。他在《建國方略》中坦言：“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³² 三民主義正是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柱。

(二) 虛心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

1. 學習借鑒國外經驗的必要性

在客觀承認西方文化先進性的前提下，孫中山十分注意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他首先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學習借鑒的必要性。孫中山在其晚年系統總結自己思想體系的代表著《三民主義》中，多次肯定了此類學習借鑒的意義和作用。他指出：“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歐美。我們為甚麼要仿效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³³ 他在論證了我中華民族“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之後，仍然強調“恢復

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還是要退後。”³⁴ 在正面肯定學習借鑒歐美之長的同時，孫中山也提醒國人反其道而行之的害處：“如果不參考歐美以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功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³⁵ 正反兩方面的論述表明，借鑒國外經驗勢在必行。

2. 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思想的主要內容

從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來看，三民主義根據其內容實質可以劃分為新舊兩個階段。毛澤東曾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標誌，精闢地論述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新、舊三民主義：“在這（註：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³⁶ 然而，不管是舊三民主義還是新三民主義，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外國的進步思想理念。考察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容，不難發現西方政治家們的學說與思想中的一些精華，已被作為養料吸收，有效地豐富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

在《民權主義》的第二講中，孫中山曾清晰地闡明三民主義與法國革命口號的辯證關係。他着重指出：“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的革命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而發達。”³⁷ 從整體上看，“孫中山首先在理論上接受法國 18 世紀資產階級革命‘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將其內涵攝入自己的思想，並形成理論基礎；其次把美國視作創建共和國的楷模；再次是從‘效法美國’轉向‘以俄為師’，從傾心歐美民主制度到讚賞蘇聯‘人民獨裁’，完成由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的飛躍。”³⁸

分別考察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中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則可以找到不盡相同的借鑒和學習對象：“民族主義方面，是以資產階級民族構成學說為思想基礎，突破狹隘的‘種族復仇’主義和籠統排滿傾向，並把民族革命和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革命聯繫在一起。民權主義方面，是以西方的民權學說為思想基石，提倡民權平等；倡行政治革命，創建民主共和政體；在三權分立思想的基礎上，借鑒中國傳統的監察制度和科舉制度，創立五權憲法。民生主義方面，以西方經濟學說為核心，既有主觀社會主義之空想，又含有民主主義的積極內核。”³⁹ 由此觀之，有效地借鑒外國的革命理念，並將其中的先進成分吸收到三民主義框架中來，是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的又一個重要動力機制。

三、創新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的有效途徑絕不僅僅是傳承與借鑒，還有一個鮮明特點，那就是創新。

(一) 孫中山構建三民主義過程中展示出的創新建樹

1. 創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出於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孫中山一向對中華文化的優勢感悟至深。他在言談或文章中多次闡述中國自古以來的文明成果，對於其中的重大發明創造尤其不厭其煩地詳加介紹。在 1918 年寫成的《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中，孫中山指出：“自古制器尚象，開物成務，中國實在各國之先。而創作之物，大有助於世界文明之進步者，不一而足，如印版也，火藥也，瓷器也，絲茶也，皆為人類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實開今日世界交通之盛運，成今日環球一家之局者，厥為羅經……中國發明磁石性質而制為指南針由來甚古，可無疑義。”⁴⁰ 在 1924 年初宣講的《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他又反復強調中國古代多種發明成果的重要意義。他說：“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⁴¹ 接着他還以“指南針”、“印刷術”、“瓷器”、“無煙火藥”、“茶葉”、“絲織品”、“拱門”、“吊橋”等為證，論述了創新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重要觀點。

中華民族的特質中與創新密切相關的是開放。針對一些西方人士認為中國閉關自守的誤解，孫中山作出了細緻的分析和善意的解釋：“歷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⁴² 隨後他列舉了西安府的景教碑、漢代佛教的傳入中國，以及明代大學士徐光啟同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友情等為案例，論證了開放同創新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2. 創新才能使落後的民族後來居上

儘管創新是中華民族的優良特質，但不可否認的是清代後期以來中國落伍了。本文第一部分中引用的孫中山在《興中會宣言》中發出的“中國積弱，非一日矣”的感慨，就是對中國當時落後現狀鞭辟入裏的批判。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引用天時地利之變化以鼓勵民眾：“天不棄此優秀眾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推覆異族之專制，光復祖宗之故業，又能循世界進化之潮流，而創立中華民國”；進而滿懷信心地指出，“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⁴³

鑒於中國已經落後的狀況，孫中山向國民大聲疾呼：“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⁴⁴ 然而，如何才能有效地趕超外國，振興中國，孫中山認為不能跟在外國後面亦步亦趨，而要選擇正確的道路。他曾以新舊美洲航綫的對比來說明問題：“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呼？然此之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繞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綫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⁴⁵ 孫中山認為，更重要的是不走老路，另闢蹊徑，是通過創新迎頭趕上，最終實現後來居上。所以他強調：“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想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⁴⁶

(二) 孫中山構建三民主義過程中創新的積極探索

在肯定創新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強調創新才能使落後民族後來居上的基礎上，孫中山在構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過程中積極探索，實現了多方面的創新與突破，主要內容如下：

1. 民族主義：以宗族主義為基礎推進國族主義

關於民族主義的內涵，孫中山曾經強調“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並且明確指出：“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⁴⁷ 為了達到其中的第一個目標，“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孫中山提出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實現途徑。他主張以“宗族”作為單位或基礎，推進國族主義，即“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假如全體國民，都能夠……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甚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⁴⁸ 孫中山之所以這樣構想，完全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的明智選擇。他指出：“中國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人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⁴⁹ 概言之，孫中山宣導的中國恢復民族主義的有效途徑，是“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這正是與西方國家民族主義有所不同的創新之處。

2. 民權主義：主張“權”、“能”分離，推行五權憲法

在民權主義領域的創新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一大亮點。首先是“權能分離”原則。孫中山自己曾明確指出：“中國今日要實現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這是甚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原理。”⁵⁰ 孫中山曾引經據典論證這一原則的歷史淵源：“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至於“權能分離”的具體內容，則可表述為“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⁵¹

其次是推行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孫中山的獨創，是指“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註：後更名為監察)、考試五個權，每個權都是獨立的”；與此同時，縣一級自治則享有四種直接民權，即“一個是選舉權，二個是罷免權，三個是創制權；四個是複決權”。⁵² 誠如他自己所說：“五權憲法是兄弟所獨創，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講過的。”⁵³ 關於這個問題，孫中山有詳盡的論述：“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英，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上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孫中山顯然是對自己的創造性設想充滿了信心：“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⁵⁴ 顯而易見，五權憲法是孫中山民權思想的核心，也是通過創新構建三民主義的典範。

3. 民生主義：積極能動的平均地權與區別對待的節制資本

關於民生主義的本質，孫中山曾作過高度概括：“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⁵⁵ 在這兩點上，同國外類似的方針相比較，孫中山均有所創新。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是積極能動的平均地權。孫中山是在深切瞭解國情的基礎上提出平均地權口號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

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了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怎麼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⁵⁶ 在推行平均地權方針的前提下，孫中山又提出七個增加農業生產的具體環節，方法，包括“機器”、“肥料”、“換種”、“除害”、“製造”、“運送”和“防災”七大問題。將平均地權同促進生產能動地結合起來，力求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便是孫中山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主張的新意所在。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是針對不同對象區別對待的節制資本。孫中山對此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分析：“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⁵⁷ 至於發展國家事業的具體構想，孫中山另在《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中作出了詳盡的規劃。

總之，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根本問題上的創新，促使孫中山民生主義昇華至一個嶄新的高度。

四、結語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坦言：“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⁵⁸ 這段話既是孫中山革命生涯中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真實寫照，又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形成過程的詳盡說明。

從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汲取優良傳統作為核心理念，吸收外國思想學說的先進成分作為有機養料，在傳承和借鑒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努力創新，這便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形成的動力機制。

後人當以先行者為榜樣，堅持傳承、借鑒和創新，努力創造無愧於民族、無愧於時代的精神財富。

註釋：

¹ 華南理工大學課題組：《珠三角歷史文化傳承與城鄉特色風貌規劃建設》，載於珠江三角洲全域規劃網：<http://www.gdupi.com/prd2014/productshow.asp?id=124>。

² 轉引自陳立夫：《中國道統》，載於新浪網：http://blog.sina.com.cn/s/blog_d2b9ecb50101aty6.html。

³ 孫中山：《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92頁。

⁴ 孫中山：《興中會宣言》，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9頁。

⁵ 孫中山：《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5頁。

⁶ 孫中山：《建國方略·自序》，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06頁。

- 7 孫中山：《〈民報〉發刊詞》，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1頁。
- 8 同上註，第72頁。
- 9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文學說)》第三章，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26頁。
- 10 同上註。
- 11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02頁。
- 12 孫中山：《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39頁。
- 13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90頁。
- 14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46頁。
- 15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49頁。
- 16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61頁。
- 17 同上註，第669頁。
- 18 同註16。
- 19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六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61頁。
- 20 同上註，第762頁。
- 21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65頁。
- 22 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59頁。
- 23 轉引自“大同思想”詞條，載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 24 同註12，第439頁。
- 25 同註1。
- 26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頁。
- 27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文學說)》之“第四章 以七事為證”，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42頁。
- 28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孫文學說)》之“第五章 知行總論”，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46頁。
- 29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三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97頁。
- 30 孫中山：《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9頁。
- 31 孫中山：《要造成真中華民國》，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430頁。
- 32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民權初步)》之“自序”，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40頁。
- 33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23頁。
- 34 同註15，第657頁。
- 35 同註33，第729頁。
- 36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 37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78頁。
- 38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孫中山思想研究》，載於中山檔案資訊網：<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284487>。

- 39 同上註。
- 40 同註27，第137頁。
- 41 同註13，第594頁。
- 42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8頁。
- 43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民權初步)》之“自序”，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42頁。
- 44 孫中山：《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6頁。
- 45 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實業計劃)》之“結論”，載於《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37-338頁。
- 46 同註15，第658頁。
- 47 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25頁。
- 48 同註14，第646頁。
- 49 同上註，第644頁。
- 50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731頁。
- 51 同上註，第742頁。
- 52 孫中山：《五權憲法》，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572頁。
- 53 同上註。
- 54 同註19，第763頁。
- 55 同註47，第526頁。
- 56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10頁。
- 57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載於《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02頁。
- 58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載於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科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